

情慾的力量

◎ 康正果

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紅杜鵑》(*Red Azalea*)是一本用淺顯的英文寫成的自敘作品，喜歡此書的歐美讀者也許會像讀一個少女的日記一樣，欣賞其敘事的單純和語言的儉樸：而凡是在毛的中國經歷過那一場歷史謬誤的人，我相信，當他們在作者閔安琪講述的故事中一再讀到那些中文句式的文革用語，大概都會對其中的反諷意味有或多或少的領會。

60、70年代的中國大陸，整個地是由惡夢和鬧劇構成的世界。除了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在《1984》一書中預言的那個反面烏托邦社會，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無產階級專政那樣，把政治控制擴張到使所有人都不復有私人生活的程度。奧威爾筆下的恐怖僅為機器對人的全面檢查和監視，只要被監控的人群中一旦建立了私人之間的「人」的關係，極權強加給他們的孤立便在無形中消解。然而，閔安琪從一懂事即步入的社會卻充滿了人對人的敵視，到處都是被挑唆起來的批判和揭發，背叛他人。於是，切斷自己與他人之間的

親密關係——從家庭關係直到朋友關係——就成了個人免受別人攻擊而不得不採取的生存方式。人們從此不敢再相信別人，同時也不敢再維持自己的獨特形象。為了把革命的火燒得更旺，所有人都或被迫或自願地視自己的生命為燃料，任其毫無價值地耗損。

勞動本來是勞動者為社會和自己創造物質財富的實踐活動，現在則由於革命的需要而被組織成一種生產鬥爭的形式，在人們的經濟行為中被分離出去，被編排成對勞動者的筋肉和精力進行殘忍折磨的偉大演出。勞動於是有了苦役的性質，它最終成了接受改造的人們在身體上自虐的宗教。譬如在「紅火農場」那樣的鹽鹼地上墾荒，是否能種成莊稼或打多少糧食已經不是首先考慮的問題，它更像是被建制為軍營或勞改隊那樣的機構，主要是用來容納從城市中撤退出來的知識青年，讓他們在與人奮鬥之後，再與天地奮鬥。這確實是一極大的諷刺，曾經在學校裏大造其反的革命小將，如今面臨的竟是一場自我改造的考驗。就是在這樣一種非人化的環境中，敘述者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向我們講述了她的情慾歷險。

閔安琪告訴我們，生活現在已經嚴酷到不准女人表現出過多的女性特徵。於是，像小翠這樣依然要將自己固有的生活習慣維持下去的人便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創造性的勞動，或者說創造了勞動成果和使勞動者得到了自我實現的勞動，乃是人性的活動。而苦役性質的勞動則是純粹的體力消耗，它使人降格為工具，退化到牲口的層次。由於革命已經否定了文明的種種成果，貧窮、卑賤和粗礪的生活境況所帶給人的不文明狀態反而被拔高成革命化的象徵。閔安琪告訴我們，她和她的墾荒戰友不但已被疲勞搞得對骯髒和儀表上的不體面習以為常，而且他們中的積極份子還刻意把不講衛生和不講究修飾捧為思想純潔的表現。生活現在已經嚴酷到不准女人表現出過多的女性特徵。於是，像小翠這樣依然要將自己固有的生活習慣維持下去的人——如喜歡在工餘之後口裏哼起小調，每天晚上把泥污的手指洗得乾乾淨淨，再把換洗的繡花內衣晾在牀頭——便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愛美的追求，讓自己輕鬆一下的情趣，最終都與墮落和犯罪聯繫一起。有天夜裏，小翠同農場的一名男工在野外幽會，探清了情況的顏隊長帶領大家把他倆當場「捉姦」，男的被判強姦罪處死，小翠隨即發瘋，後來淹死在河裏。

我們這些在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革命化的禁慾氛圍中形成自己的性觀念的。很多人都曾被革命的教育造就得十分無知，遂將人性中至為美好的東西視為邪惡。只是後來經歷了太多的失望和痛苦，知道了一些被暴露出來的事實，才逐漸認識到，共產黨人其實並沒有建立甚麼全新的道德理想。在性的問題上，他們最初也曾有過「一杯水主義」的開放態度，但後來為了政治的需要，才對革命隊伍內的男女關係有了嚴厲的管

制。總的來說，他們始終把道德從屬於政治，並沒有為道德賦予獨立的價值。所以，整個社會對性的嚴格控制，可以說一直都是全面對人進行控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極權主義者深知，在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關係中，性關係是最危險的。把性犯罪定性為反革命固然荒謬之極，但就極權主義的邏輯而言，它也自有它的道理。

小翠只是一個晴雯型的犧牲品，心雖好強，人實軟弱。《1984》一書中的朱利婭則是一個自覺地用性來顛覆專制的女人，她公然揚言要以她的淫蕩與那個社會的全面封閉對着幹，結果她把驚弓之鳥一般的溫斯頓從無比的孤立中拉入了自己的懷抱，與他一起超過了界線，在專制強加給個人之間的鐵壁上戳了一個小洞。《紅杜鵑》一書的敘述者也頗有一點朱利婭的刁鑽古怪，正是在小翠悲劇的導演者顏隊長感情最脆弱的時候，她同這位長相和作風均像男人的女戰士掛上了情慾的鈎。

顏本人也是一個不幸被那個時代扭曲的人物，一個被革命俘獲去的狼孩，女性的情懷被她扮演的角色死死地禁錮起來。只是在小翠受害而死之後，她才在若有所失中有了動搖，人性的需求才得以趁機抬頭：她有了暫時離開人群，去找一個幽僻之處清靜一下的衝動。怪不得極權的統治總是要在人與人的緊迫磨擦中製造每一個人的孤立，原來一個人一旦有了獨自而處的時候，他／她那被群體毒化的自我就會自動地得到了一定的解毒。顏背着人拉起了二胡，用音樂洗滌自己，同時也感召了偷聽的閔安琪。閔說：

在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革命化的禁慾氛圍中形成自己的性觀念的。很多人都曾被革命的教育造就得十分無知，遂將人性中至為美好的東西視為邪惡。

顏和閔冒險在集體工棚的牀鋪上幹起了互相親吻撫摸的事情，而遮掩着她們的只是稀薄的蚊帳。諷刺的是，那蚊帳上由於被顏綴滿了毛主席像章，才較好地發揮了掩蔽的作用。

我通過二胡感受到了她的真實的自我。我也被她喚醒。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我面對着一個我至今尚不認識，卻如此驚喜地發現了的自我。（頁87）

接下來的故事在今天看來也許有幾分荒唐和滑稽，但我們應該理解，是精神的極度貧乏把人對情愛和友誼的樸素渴求弄成了那麼可笑的樣子。顏在閔面前承認，她也像小翠那樣暗暗喜歡了其他生產隊中的一個男子。她向閔談論他，又讓閔代筆給他寫信，通過分享關於一個異性對象的秘密，兩個同性開始相好起來。真不知她倆是把談論一種異性戀的單相思當作引子，好在排演的當口兒轉入同性戀的關係，還是限於男女大防的嚴密，不得不在同性的懷抱裏尋求代償性的滿足。總之，對於一個所愛的對象的迫切需求，已使她們顧不上細究性別的選擇。由於不准公開地表達人與人之間在身體和語言上的親密，這一對突然陷入了同性戀情境的女人便如脫韁之馬，冒險在集體工棚的牀鋪上幹起了互相親吻撫摸的事情，而遮掩着她們的只是稀薄的蚊帳。諷刺的是，那蚊帳上由於被顏綴滿了毛主席像章，才較好地發揮了掩蔽的作用。後來發生的事情向我們證明，這一危險的關係之所以最終沒有敗露，完全是因為閔的情人身為生產隊的隊長和黨的支書。閔簡直弄不清她扮演的是甚麼角色，到底是顏所想像的男人，還是她自己。趁機釋放的情慾把她們拖入了沉溺的滿足，她們不敢正視，也完全不懂得她們所作的事情。當閔問顏她們在幹甚麼的時候，顏竟用一句毛主席語錄來回答她的問

題，說她們是「在戰爭中學習打仗」。

從今日美國的lesbian視角讀解閔和顏的情慾歷險，恐怕是會導致誤讀的。她們並不是為了逃避男人才廝磨在一起，而是由於生活的全面政治化把人壓迫到一種宣泄情慾的極端形式中以求吐一口悶氣。本來年輕人完全應該不分男女地友好交往、坦誠交談，如今這些正常的人際關係統統成了禁忌，人與人都成了一棵棵孤立在地面上的樹，只能在黑暗的地下讓各自的根鬚糾結在一起，情慾於是就噴出了焊接的火花。為維護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而一再防範的感染，如今居然在它最純潔的核心起了病灶。閔在讓自己身上的人性伸張起來的同時，也觸動了顏身上的人性。在那個青春過於荒涼的歲月裏，她們的結合畢竟開出了一朵慘淡的小花。

自敘的後半部把我們引入了卡夫卡(Franz Kafka)那樣的荒誕世界，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比卡夫卡筆下的審判和城堡更讓人驚心動魄，因為無論是上海電影廠內一群女演員的政治競爭，還是和平公園裏的窺淫癖社群，全都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想像出來的鬼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活鬼，是讓人像鬼一樣活着，或者說把人置於非人的狀態。閔安琪幸運地被選中去演江青主持的革命樣板電影，卻不幸在後來的角逐中被淘汰。又是在從集體中游離出來的時候，在情緒最消沉的情況下，閔同另一個黨領導掛上了情慾的鈎。那是在暗淡的休息室中，在兩個人都吸菸的時候，兩個菸頭發出的暗紅使他們對上了火。這一次她找到的情人是個男人，有趣的對比是，這位由北京最高當局

派來的總監卻一副十足的女性模樣。是身分和地位撐起了他的首長的架子，只是在同閔的相處中，他才露出了他的病態和頹廢，以及政治上的異議。人與人的親密常會傾向於削弱他們對黨和領袖的忠誠，我想，這就是最高統治者一再在他的臣民間挑起鬥爭的主要原因。

極權已經使極權社會的全體成員中魔，連操縱政治控制的一群也對控制所產生的威力感到非常恐懼。總監不得不和閔溜到偏僻的公園裏幽會。中國的城市儘管很大，城裏的情侶唯一可去的地方卻只有公園，公園反而成了很擁擠的地方。常常是配上對的男女在路旁樹下情意纏綿，沒有人陪伴的單個份子則像遊魂一樣躲在樹叢後面，企圖從窺視別人的親暱中掠得一絲興奮。閔的記敘告訴我們，當她與總監在黑暗的樹影下依偎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確實看到了一些在暗處窺視的身影，他們能聽得出，伴隨着他們的親熱，背後的局外人竟不可遏制地發出了呻吟。那曾經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竟使天下的怨女曠夫孤苦伶仃至於斯極！連總監這樣的高幹黨員都不禁慨嘆：

他們奉獻給偉大舵手的热情被出賣了。噢，多麼壯觀的場面！我希望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能目睹它。他會受到震動，只是他已經陽萎……。（頁263）

偉大領袖此時確實已經氣息奄奄，全中國人民在政治和性上所受的壓抑也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隨着「四人幫」的倒台，閔所參加的革命樣板電影製作組草草散去，她的自敘也到此終止。中國的世事變化

之快就像一盤不斷用來轉錄新曲的磁帶，社會的興奮點總是一齊趨向眼前的熱潮，而關於苦難和屈辱的記憶也自然被漸漸洗掉。在今日的中國，性不再是太少，而是太濫太濫，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閔安琪所講的故事可能顯得古老而難以想像。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對人性的踐踏和對人與人之間一切美好東西的漠視所造成的惡果，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就情慾本身而言，其實無所謂好壞，倒不如把它理解為生命的一種動力。在比較健全的社會中，在社會對人的全面發展和個人的自由表達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和更多的機會之情況下，情慾的滿足同人的自我實現的需求其實是一致的。相反，在人性遭到全面否定的情況下，人的基本慾求越被視為邪惡，它便越是被逼上危險的方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被扭曲，孤獨的個體便越容易使自己的慾求陷於生理和物質的層次上。今日國內到處受到譴責的「人慾橫流」現象固然有複雜的成因，但尋根究底，這一切都是幾十年來一直把人當靶子來加以打擊的結果。

在我曾插隊落戶的地方，村民有一句黑色幽默的話，叫「活鬼鬧世事」，這句話生動地描述了我在自己的國家走入人群時的感覺。

康正果 生於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碩士。現在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1988)、《女權主義與文學》(1994)和《重審風月鑑》(1995)。

今日國內到處受到譴責的「人慾橫流」現象固然有複雜的成因，但尋根究底，這一切都是幾十年來一直把人當靶子來加以打擊的結果。